

从遣子入侍看唐对吐蕃吸纳 中原文明的争议

黄辛建

[摘要]唐代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继承并发展了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的羁縻制度,并广泛运用于边疆地区。与和亲一样,遣子入侍及各类书籍、工匠技艺、谷物种子等的输出,是中原文明向外输出的重要元素,更是唐朝羁縻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唐王朝对是否输出中原文明虽存在争议,但却始终保持着积极、开放的态度。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吐蕃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吸纳中原文明,促进了汉蕃文化的良性互动和吐蕃文明的形成,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藏族文化。

[关键词]民族政策;吐蕃文明;中原文明;遣子入侍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2)08—0200—05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委托项目“历代中央政府对岷江上游藏区治理研究”(SC10W231)、四川省教育厅面上课题“藏彝走廊:民族变迁与融合”(ASA11—20)、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重点课题“藏彝走廊:民族变迁与融合”(11SB1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辛建(1979—),男,四川安县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助理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15

公元7世纪初期,兴起于西藏雅隆河谷一带的悉补野部,历经郎日伦赞等数代赞普的不断经营,至松赞干布^①时期开始崛起。吐蕃建国以后,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积极学习、借鉴、吸纳唐朝、大食、尼婆罗、天竺等周边国家的先进文化养分,创造吐蕃文字、厘定法律、引进佛教,不断走向强盛,形成了吐蕃文明,并最终发展演化为今天的藏族文化。其中,吐蕃对唐文化,即中原文明的吸取、借鉴尤为突出。公元634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入唐,唐太宗随之遣行人冯德遐赴藏抚慰。公元641年,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吐蕃开始大规模、官方地吸取中原文明养分。目前,学术界对吐蕃文明和中原文明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有一些成果问世,但对唐王朝在吐蕃吸纳中原文明过程中的态度的梳理则有所忽略。^②本文试以遣子入侍为切入点,尝试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吐蕃遣子侍唐的缘起

遣子入侍是少数民族政权将贵胄子弟,甚至王子,遣其为质,奉为正朔,是臣属并取信于对方的一种方式。陈金生认为,遣子入侍的起源与原始宗教、部落争端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从

其思想根源来看,质子作为人质的一种,与人类“与天为质”的原始宗教观念和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从实际行为来说,部落争斗具有掠夺俘虏、掠夺人质的属性。^{[1] P. 47}殷商时期,商纣王将周文王长子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为羹,赐文王”。^[2]春秋战国时期,群雄逐鹿,周王朝权力旁落,诸侯争霸,以子纳质在诸侯国之间频繁发生。遣子入侍作为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之间政治博弈的一种手段滥觞于汉代。《册府元龟》载:“夫四夷称臣纳子,为其来久矣。自汉氏建元之后,穷兵黩武,开拓提封,北逐匈奴,南诛闽粤,由是百蛮慑伏。厥角稽颡,或内向而请吏,或遣子于宿卫。武力之盛,振古莫传。”^[3]唐代,遣子入侍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唐王朝周边藩篱邻国纷纷遣子入侍。景龙元年(公元707年),渤海王国向唐朝“遣子入侍”,“请备宿卫”。^{[4] P. 56}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新罗王子金守忠来朝留宿卫,赐宅及帛以宠之。^[3]突厥是唐朝的一大劲敌,也长时间遣子入侍唐朝。其朝中重臣阿史德元珍曾作为入唐侍子,习中国风俗,知边塞虚实,对于骨咄禄推动复国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给唐朝造成了极大威

胁。^{[5] (P. 81)} 据《册府元龟》,唐时遣子入侍的有新罗、契丹、渤海、高丽、吐蕃等国。^[3] 除此之外,方铁认为还有南诏、高昌、波斯等国。^{[6] (P. 73)}

吐蕃遣子入侍唐朝,始于文成公主进藏。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入唐,唐太宗随之遣行人冯德遐赴藏抚慰,由此开启了唐吐之间200多年的通好、和亲、会盟、战争的交往。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由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送婚。松赞干布亲自前往河源迎接,见道宗执子婿之礼。^[7] 渐慕华风,遣酋豪子弟,入唐王朝国学学习《诗》、《书》。^[8] 自此,吐蕃开始遣子入侍唐朝,习中原文明和礼仪。景龙元年(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竭力促进唐蕃和好,也曾派遣吐蕃贵族子弟入长安附国子学读儒术。^{[9] (P. 7)} 吐蕃侍子入唐后多至太学修读。在唐王朝都城长安,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吐蕃侍子聚居点。^{[10] (P. 25)} “是时,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使之讲论。”当时,唐周边民族学者云集长安,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11]

二、吐蕃对中原文明的吸纳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藏族文化,尤其是藏族古代文化看成是单一文化,把藏族当作是一个单源的民族。然而,考古发现证明: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上的原始文化就已是一个具有多重性特征的多元一体文化。黄河流域的古老文明,及其以北的草原游牧文化,以及东南亚热带河谷农业文化,都曾从不同的方向汇集于雄伟壮丽的青藏高原,使藏族地区的原始文化,在本身固有的土著文化基础上,呈现出一种甚为复杂的多重性特征。^{[12] (P. 149)} 构成藏族早期族源的氏族人群至少应有三个基本来源:即西藏腹心地区的土著氏族人群,来自西藏东部横断山脉地区属于夷人族系的氏族人群和来自西藏东北方向黄河上游地区古羌族系的氏族人群。^{[13] (P. 318)}

虽然藏族古代文化具有多重性的特征,但由于地处高原,早期吐蕃社会文化较为落后。据《旧唐书》记载,吐蕃初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虽有官不常厥职,临时统领。用刑严峻,小罪剜眼鼻,或皮之,但随喜怒而无常科。宴异国宾客,必驱牦牛,令客自射牲以供饌。贵人处于大氈帐,名为拂庐。寝处污秽,绝不栉沐。接手饮酒,以氈为盘,捻氈为碗,实以羹酪,并而食之。^[8] 公元7世纪初期,兴起于西藏雅隆河谷一带的“雅隆悉补野”部,

历经郎日伦赞等数代赞普的精心经营,至松赞干布时期开始崛起。松赞干布继赞普位后,在尚囊的辅佐下,成功平息部落叛离,稳定内部局势,于633年迁都逻些,这也是其内部政治稳定和向外拓展的信号。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是一个有野心、有胆识和开拓精神的人,其继位后深感这一切不能适应其建立强盛的吐蕃王朝政权的需要。^{[14] (P. 119)} 松赞干布很快即采取了两项基本的政治方略:一是向外开拓和发展;二是在内部进行大规模制度建设,开始大力吸收、借鉴大唐、大食等周边先进文化以构建吐蕃文明。藏籍称,松赞干布时期,自东方汉土得工艺历算之术,自南方天竺译出佛经,自西方尼婆罗等处启食用宝藏,自北方突厥等处取得法治条规。^{[15] (P. 32)}

由于唐朝实行开放、开明的民族政策,加之唐王朝经济、文化空前发展,中原文明空前繁荣,唐朝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唐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深深吸引着吐蕃等周边甚至更远地区的民族。因此,吐蕃王朝始终将和唐王朝交往作为基本国策,与唐保持着或战或和的异常频仍的联系。从贞观八年吐蕃遣使入唐到吐蕃赞普达玛被杀,即从公元634年到公元842年的209年间,唐吐遣使互访就达290余次。其中,吐蕃王朝使者出使唐朝190余次,唐王朝使者入藏100余次。^{[16] (P. 150)} 吐蕃遣使入唐次数远远多于唐遣使入蕃的次数。从赞普芒松芒赞到达玛时期,即从公元650年到公元842年,双方有史可查的战争达到192次。^{[17] (P. 70)} 吐蕃正是在与唐王朝或和或战的历程中,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两种方式积极吸纳中原文明元素。一方面,吐蕃通过战争、派遣使者等方式走出去,到唐王朝主动学习中原文明。遣子入侍正是吐蕃主动走出去学习中原文明的重要手段之一。另一方面,吐蕃利用与唐和亲等方式主动引进中原文明。文成公主带入西藏的养蚕、造酒、碾磨、造纸的工匠,金城公主入藏携带的绣花锦缎、工技书籍、各种器物及工匠、乐师、杂技等均是吐蕃走出去主动引进的中原文明元素。

三、唐对吐蕃吸纳中原文明的争议

由于唐吐之间,战与和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虽然双方是甥舅之国,但吐蕃“既自恃兵强,每通表疏,求敌国之礼,言词悖慢”,“虽每遣行人,来修旧好,玉帛才至于上国,烽燧已及于近郊,背惠食言,不顾礼义”。^[8] 检视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史

料可以发现,吐蕃始终是将双方的交往定位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如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中,吐蕃将唐遣使者来访称为前来“致礼”,甚至将唐王朝入吐蕃之物品称为岁贡。如“及至虎年,多思麻之冬季会盟于则地,由论绮力思扎悉诺则布召集之,以唐人岁输之绢缯分赐各地千户长以上官吏。冬末,唐廷皇帝崩,新君立,不愿再输帛绢,割土地。”^[18] (P. 145-156) 而唐朝也始终将吐蕃视为自己的主要劲敌加以防范。

在如此不和谐的双方总体关系发展趋势中,唐王朝对于吐蕃摄取中原文明存在较大争议,并随着吐蕃王朝的不断强大及对唐王朝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而甚嚣尘上。自公元 7 世纪初吐蕃自雅隆河谷崛起后,先后统一青藏高原,征服川西高原和河湟陇右诸部落,唐蕃之间缓冲地带尽失,唐吐由是开启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战争。贞观八年(公元 634 年)吐蕃遣使入唐,唐行人冯德遐随之入藏抚慰,双方开启了正式的官方往来。贞观十二年(公元 638 年)松州之役双方首次交锋,公元 641 年文成公主入藏,唐吐因此处于双方关系的蜜月期,唐应吐蕃请求,派去造酒、碾磨的工匠,并给予蚕种,于是各种先进生产技术大量传入吐蕃,^[19] (P. 27) 吐蕃开始大规模、官方地广泛吸取中原文明因素。

龙朔三年(公元 663 年)吐蕃与吐谷浑不和,兵临吐谷浑,唐将薛仁贵等奉命率众十余万讨伐,在大非川为蕃军所败,吐谷浑被灭。咸亨元年(公元 670 年)薛仁贵再次兵败大非川,吐谷浑皆没于吐蕃。至永隆元年(公元 680 年)吐蕃已“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巂接壤”^[8]。伴随着日益紧张的唐吐关系,唐王朝内出现了是否允许吐蕃摄取中原文明的质疑声,遣子入侍首当其冲。通天二年(公元 697 年),四夷多遣子入侍,吐蕃大论噶尔钦陵,突厥的阿史德元珍等,皆曾充任唐朝侍子,知悉中原文明礼仪,其后竟为边害。囿于史料缺乏,我们目前已经无法对吐蕃遣子入侍唐朝的具体情况和效果进行全面阐释。不过,吐蕃史上却有三个异常重要的人物均曾侍唐,并在回蕃后对唐构成了极大威胁。其一为仲琮。“仲琮为吐蕃大臣,咸亨三年(公元 672 年)吐蕃仲琮来朝。先是,仲琮年少时,尝充质入朝,诣太学生例读书,颇晓文字。”^[3] 其二为论钦陵。其父曾赴长安为松赞干布求亲,即“性明毅严重,讲兵训师,雅有节制,吐蕃之并诸羌,雄霸本

土,多其谋也”的禄东赞。^[8] 掌持吐蕃朝政多年的论钦陵,曾入侍唐朝,其“皆因充侍子,遂得遍观中国兵威礼乐”^[3],长时期成为吐蕃对唐侵略的主导者。吐蕃三大贤王之一的赤松德赞,唐代汉文译作娑悉笼猎赞,手下有名的重臣—恩兰·达扎路恭,即《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吐蕃大将马重英,以领兵打入唐朝京师而闻名,今天耸立在拉萨布达拉宫前面的最高石碑就是 1 200 年前为他树立的红功碑。达扎路恭之远祖“悉腊”被称为“饱学之士”,《唐诗记事》中还记载有他用汉文作诗的故事。^[12] (P. 39) 他早年曾侍唐,任“吐蕃舍人”,以能言善辩著称,后被派入长安迎聘金城公主。^[10] (P. 25)

正因入唐侍子回蕃后对唐构成的极大威胁,朝官薛谦光就上《止四夷遣子入侍疏》,他认为:“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并叨殊奖。或执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簧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国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或委以经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归蕃。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在夷狄广其从横之智。虽则慕化之美,苟悦于当时;而狼子孤恩,旋生于过后。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由于此。”他认为侍子入侍“应一皆禁绝,必若先在中国者,亦不可更使归蕃,则夷人保疆,边邑无事矣”。^[3] 但未被采纳。

神龙元年(公元 705),唐遣宰相卢钦望等 22 人与吐蕃和盟,双方关系暂趋缓和,中宗李显专门颁布《准蕃人读书国子学敕》,明令“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学习经业,亦附国子学读书”^[20]。与文成公主入藏,吐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8] 相对照,李显之所以要颁布该敕令,当是针对反对吐蕃等周边政权遣子入侍的人在建议禁绝侍子之议未准后,建议将侍子遣往国学以外的其他地方习读的回答。唐玄宗李隆基《放还诸蕃宿卫子弟诏》将包括吐蕃侍子在内的所有侍子均“放还国”,彻底终止了遣子入侍问题的争议。“我国家统一寰宇,历年滋多,九夷同文,四隩来暨。夫其袭冠带,奉正朔,禺禺然向风而慕化,列于天朝,编于属国者,盖亦众矣。我则润之以时雨,照之以春阳,淳德以柔之,中孚以信之,玄风既同,群物兹遂,莫不自天壤,穷海域,厥角以请吏,执贽以来庭,皇唐之德,于以为盛,今外蕃侍子,久在京国,虽威畏之及,自远毕归,而羁旅之志,重迁斯在。宜命所司,堪会诸蕃,充质宿卫子弟等,量放

还国。契丹及奚延通质子,并即停追,前令还蕃首领等,至幽州且住,交替者即旋去。朕欲以鸟兽咸若,华戎俱泰,来则纳其朝谒之礼,去则随其生育之心,推我至诚,崇彼大顺,含宏之施,德莫厚焉。”^[21]

景龙元年(公元710年),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籍多种和一应器物入吐蕃,随有大批的工匠和乐师、杂技等,再一次掀起了吐蕃吸纳中原文明的浪潮。利用金城公主进藏之机,吐蕃以请公主的汤沐地为名得河西九曲,随之连年袭扰陇右,西山不稳。公元714年,唐朝和吐蕃和盟,定国界于河源。公元727年到公元728年间,吐蕃占领河西瓜州。面对日益紧张的唐吐形势,唐王朝再度哗然。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曾经作为侍子侍唐并迎娶金城公主之吐蕃“悉腊”等人至京,以金城公主名义求《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更是引起争议一片。秘书省正字于休烈上疏对求书事宜强烈反对并陈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疏中道:“戎狄,国之寇也;经籍,国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无备;典有恒制,不可以假人。传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所以格其非心,在乎有备无患。昔东平王入朝求史记、诸子,汉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诸子杂诡术。夫以东平,汉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战之书,今西戎,国之寇讎,岂可贻经典之事。”“且臣闻吐蕃之性,剽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若达于书,必能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兴废之兵;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异借寇兵而资盗粮也!臣闻鲁秉周礼,齐不加兵;吴获乘车,楚疲奔命。一以守典存国,一以丧法危邦,可取鉴也。”同时,于休烈认为,求书并非金城公主意愿,“虑有奔北之类,劝教于中。若陛下虑失蕃情,以备国信,必不得已,请去春秋,当周德既衰,诸侯强盛,礼乐自出,战伐交兴,情伪于是乎生,变诈于是乎起,则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若与此书,国之患也。”在疏中,于休烈提出了应对的办法,即“狄固贪婪,贵货易土,正可赐之锦绮,厚以玉帛,何必率从其求,以资其智。”^[21]疏奏不省,制令秘书省写与之,并遣工部尚书李曷往聘,赐物万计。^{[7][8]}公元734年6月,双方和盟,规定以赤岭为两国边界,但并未停止双方的征战。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吐蕃乘机夺取了唐与吐蕃、南诏之间的川西一带,并

入据长安15天,唐朝开始走向没落。此后,唐吐之间的接触主要体现在军事冲突、使者往来和物品互赠上,和亲、遣子入侍等已无生存的土壤,关于中原文明是否应当输入到吐蕃等国的争议也随之销声匿迹。

四、余论

唐代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继承并发展了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的羁縻制度,并广泛运用于边疆地区,以取得“实资辅佐之功,广我怀柔之道”^[22]的效果。和亲、遣子入侍及各类书籍、工匠技艺、谷物种子等的输出作为中原文明输出的方式,是唐朝羁縻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唐王朝正是要通过中原文明的输出达到羁縻的目的。这一点可以从唐王朝准许吐蕃遣子入侍的目的中,一窥究竟:“夫国学者,立教之本,故观文之道,可以成化。痒序爱作,皆分泽于神灵;车书是同,乃范围于天下,戎狄纳款,日归夕朝,慕我华风,孰先儒礼?由是执于干羽,常不讨而来宾;事于俎豆,庶知几而往学。彼蓬麻之自直,在桑萁之怀音,则仁其远哉,习相近也。自今以后,蕃客入朝,并引向国子监,令观礼教。”^[21]通过输出中原文明,使吐蕃等懂国学,知礼教,慕华风,均“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3]是唐王朝“羁縻”政策的重要举措。

实际上,唐朝对中原文化输入吐蕃的争论并不是全盘肯定或者全面否定。通过对新旧《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资治通鉴》等汉文史料及相关藏文文献查阅后发现,唐朝输入吐蕃的中原文明因素异常广泛,主要包含了以下几大类:一为物品,主要包括丝绸、茶叶、瓷器、造纸、棉帛、佛像、蚕种、谷物种子等;二为匠人,主要有造酒、碾、硃、纸、墨之匠,杂技诸公;三为书籍,包括五经、佛经、历算、医药等书籍。而对上述几大类物品,除五经等书籍外,唐王朝对其他事物的输出并无多少反对的言论,反而异常慷慨。而反对的声音主要集中在是否应当准许侍子入国子学习读国学、是否应当将文史经籍输出等问题上,实质是对事关朝纲精要、经国之术、汉法礼仪等中原文化精粹,对国学是否应当开放的争论,是对“借寇兵而资盗粮”的担忧。

对于包括国学等中原文明的输出,唐王朝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开放的。即使在与吐蕃等政权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候,仍是如此。准许吐蕃以金城公主名义的求书,中宗李显颁布的《准蕃人读

书国子学敕》,玄宗李隆基的《放还诸蕃宿卫子弟诏》等均是唐王朝力排异议,坚持向周边各民族政权输出中原文明的具体措施,是其羁縻政策的具体实行。约成书于唐开元年间的《龙筋凤髓判》卷二载一案:“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处绫锦及弓箭等物请市,未知可否?”被判定为:“听取其市实可威于远夷,任己私收不足损于中国,宜其顺性,勿阻蕃情。”^[21]该案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唐朝对中原文明输出的积极态度。

自古以来,汉藏之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藏文文献记载,朗日之世,即松赞干布之父郎日伦赞,从汉地引入星算之术及医药,^{[23] (P. 13)}因当时吐蕃尚无文字,仅靠口口相传,因此影响不大。此后,汉藏交往日益深入。在敦煌藏文文献中,就存有《战国策》、《尚书》等译自汉文的古代文学作品。^{[24] (P. 416-433)}唐朝时期,吐蕃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采取遣子入侍、和亲、战争、引入书籍等方式,源源不断地吸纳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唐王朝则对中原文明的输出采取了积极、开放的政策,敞开大门,积极推出中原文明因素,促进了汉蕃文化的良性互动和吐蕃文明的形成,为今天的藏族文化最终形成作出了贡献。

注释:

①汉文史料关于“松赞干布”的译名多有不同,有器宗弄赞、弃宗弄赞、器宋弄赞、不弗弄赞、弃苏农等。

②关于吐蕃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有:石硕《论地缘因素在吐蕃文明东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石硕《从文明的相融性因素看吐蕃文明东向发展的必然性》,《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洛加才让的《吐蕃王国和勃律古国的政治及其文化关系研究》,《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霍巍《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任新建《藏族文化构建中对汉文化的吸收与整合》,《中华文化论坛》2011年7月等。

参考文献:

- [1]陈金生. 试论原始宗教与质子产生的渊源关系[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0(3).
- [2]殷本纪第三[A]//史记(卷3)[Z].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3]外臣部·纳质[A]//册府元龟(卷996)[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4]魏国忠. 大柞荣遣子侍唐时间考[J]. 北方文物, 1985(4).
- [5]朱振宏. 古代突厥民族历史意识兴起原因探析[J]. 史学史研究, 2010(4).
- [6]方铁. 汉唐王朝的纳质制度[J]. 思想战线, 1991(2).
- [7]新唐书·吐蕃传[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8]旧唐书·吐蕃传[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9]王森. 西藏佛教发展史略[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10]任新建. 藏族文化构建中对汉文化的吸收与整合[J]. 中华文化论坛, 1994(2).
- [11]资治通鉴(卷195)[Z].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2]格勒. 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
- [13]石硕. 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 [14]石硕. 吐蕃政教关系史[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 [15]巴俄·祖拉陈瓦著. 贤者喜宴摘译[J]. 黄颢译.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0(4).
- [16]谭立人, 周原孙. 唐蕃交聘表[J]. 中国藏学, 1990(2).
- [17]杨永红. 使者往来与唐蕃军事[J].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
- [18]王尧, 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Z].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2.
- [19]藏族简史编写组. 藏族简史[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
- [20]唐会要·附学读书[Z].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 [21]全唐文(卷26、365、172)[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2]唐大诏令(卷42)[Z].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23]五世达赖喇嘛著. 西藏王臣记[Z]. 刘立千译注.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2.
- [24]王尧, 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收稿日期: 2012-05-07 责任编辑 杨春蓉